

七十年代 小说研究

程光炜◎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七十年代 小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十年代小说研究/程光炜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161 - 3966 - 0

I. ①七… II. ①程…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528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59 千字
定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程光炜

2010年秋冬，我在澳门大学中文系担任客座教授，在讲授三门课之余，对第二年的博士生讨论课开始有所设计。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的“重返八十年代”博士生讨论课，已有五年之久。因此即将开设的这门新课，想深入触摸一下80年代文学的起源和脉络，而被文学史研究忽视的70年代小说显然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对象。

80年代文学的发生，启动点是“文化大革命”终结，然而向深处考量，60年代的青年政治运动，70年代惊心动魄的社会事变尤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某种思想的源流，未必与80年代思想和文学的孕育与展开没有关系。而过去的80年代文学思潮、文艺理论和批评，除了将之列于否定对象，基本没有展开追本溯源的工作。新时期的80年代历史叙述，则更多强调80年代与六七十年代思想和文学之间的断裂。这是我们决定利用博士生讨论课堂从事此阶段研究的初衷。

参与撰写文章和讨论的是2010级、2011级两届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每天泡图书馆，四处查找资料，经常就所做的研究切磋和探讨。有的同学，还把刚刚完成的论文初稿寄给我，希望我提出修改意见。即使在课堂上讲完之后，根据大家的建议，不少同学仍然花费了很大精力修改初稿，订正有关史实，并对有关结论反复调整充实。这部主要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两届博士生撰写的论文集，就是2011—2012年课堂讨论中结出的学术成果。相信读者一定会为他们思想的锐气，扎实老练的资料功夫，以及不乏新鲜的见解而感欣慰。

这是国内目前第一部集中讨论和研究中国七十年代小说的论文集。

2013年9月12日记于家中

目 录

序	程光炜 (1)
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	程光炜 (1)
文学的“超克”	
——再论蒋子龙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程光炜 (18)
七十年代的话语“围城”	
——读《沸腾的群山》和《中国行日记》	胡红英 (38)
侧耳倾听	
——从《长长的谷通河》论及战争创伤	慈明亮 (56)
“我们这代人”	
——七十年代与《公开的情书》	李 雪 (74)
历史重构与文化想象	
——小说《一双绣花鞋》及其阅读传播史	张书群 (90)
被话语绑架的历史反思	
——重读《晚霞消失的时候》	艾 翔 (110)
如何跨越“分界线”	
——《分界线》的创作及新时期张抗抗的“转型”研究	赵黎波 (132)
知青小说的起点	
——郭先红《征途》读后	朱厚刚 (148)
“深入生活”的创作	
——读《万山红遍》	范阳阳 (166)

2 七十年代小说研究

苦难与贫乏

——对《波动》的个人阅读…………… 慈明亮 (188)

作为陪衬的女人们

——长篇小说《响水湾》之一角…………… 李 雪 (211)

《万年青》的文学维度…………… 魏华莹 (225)

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

程光炜

当我们准备研究70年代小说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有两个框架的存在。一个是以“文学是人学”为标准来否定“显流文学”文学价值的观点。^①另一个主张把文学价值认定放在对“地下文学”的挖掘开采工作上。^②应该说，它们完成了研究“文革文学”的最基础的工作，这种工作被清楚地建筑在文学与政治相对立的逻辑结构中。如果脱离这些成果，等于脱离了70年代小说的历史语境；如果在这些成果中继续踏步，也等于没有与历史语境展开对话。但是既不脱离语境又展开对话就需要想想别的办法，然而所谓办法又必须在找出来的一些问题中产生，这是我们目前感到为难的地方。

^① 参见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十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种认识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论。对启蒙论思潮具有规定性意义的，是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分载于《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另外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钟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还有当时的大量文论、文学批评都发挥了声援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与这一思潮的历史联系非常的密切。

^② 20世纪90年代后，因社会转型而触发的“地下文学”挖掘开采热在文学界兴起，较有代表性的是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陈思和的论文《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话录》（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禾编的《持灯的使者》（台湾出版），以及廖以武编选的《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和林莽等对食指、白洋淀诗群的发掘等。

一 它有起点性的意义

在研究70年代小说时，如果非要确定这些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我觉得是没有意思的，这样的确定显然取自80年代重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结论，而并非研究者自己的真正发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将“文革历史化”的情况下，关于“文学性”或“非文学性”的争执是没有结果的。有人提醒说：“在日本的文学家中很少有超越自己，溢出作品规范之外这种类型的作家。说其数量之少，不如说这样的类型没有清楚地浮现到历史的地表上来，而是以隐形的方式存在着。”^①如果说，70年代公开发表的《金光大道》（浩然）、《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闪闪的红星》（李心田）、《虹南作战史》（上海县写作组）、《牛田洋》（南哨）、《沸腾的群山》（李云德）、《万年青》（谌容）、《响水湾》（郑万隆）、《使命》（王润滋）、《红炉上山》（韩少功）、《对门》（贾平凹）、《优胜红旗》（路遥）等都是“很少有超越自己年代”的小说，那么也不能说70年代的“地下小说”《第二次握手》（张扬）、《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公开的情书》（靳凡）、《波动》（北岛）就一定“超越自己的年代”了。一定意义上，他们的写作也许是来自对“灰皮书、黄皮书”和50年代解冻文学《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的不自觉的模仿。“‘皮书’的出版史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②他们对自己作品的重新定义，更毫无疑问的是80年代后对它们的“再确认”和“再阐发”。这种事实在北岛、靳凡和礼平的访

① [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等编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3页。

② 沈展云：《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灰皮书、黄皮书》，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据他统计，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十余年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出版社，“大约出版了两千种外国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皮书’”。“内部发行”的政治著作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赫鲁晓夫主义》、《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通向奴役之路》；文学著作《人·岁月·生活》和《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和《艾略特论文选》等。有很多材料证明，北岛、礼平等人在此期间都曾读过上述著作。

谈中非常清楚地存在着。^①但我们也不能由于这些作家没有超越自己的历史，就不再对那些“没有清楚地浮现到历史的地表上来”的作品类型进行历史观察，了解那些“以隐形的方式存在着”的小说是否连接着80年代文学的兴起，是否还关系到90年代文学的发展形态和方向。也许正是在那些作品的“隐形方式”中，我们找到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有价值的线头。

前些时候，我仔细研究过蒋子龙发表在《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上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写过《文学的“超克”——再论蒋子龙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一文。^②我发现，这是一篇延续“十七年文学”模式，同时预示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的小说，作为新时期改革的先声和自身“文学超克”的思想模式，它把改革开放30年势如破竹的历史趋势和阻碍改革正常发展的诸多因素都包含在作品里了。例如，主人公霍大道对阻碍工厂正常生产感到不满，他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的行为让人想到几年后出现的乔厂长们。他与副局长徐进亭之间有这样一对话：

我可再也经不住大火了，每走一步都要反复掂量掂量。与其走错步，不如不迈步，何苦呢！

所以就躲到医院的病床上去？不朝着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个宏伟目标往前奔了？不革命了？你这个领导干部躺倒了，对群众还怎么领？怎么导？

霍大道纠正“文化大革命”破坏工厂生产的举动，与邓小平大力推动整顿和激烈批评极“左”派观点如出一辙。他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为读者勾画了1975年的严峻形势：

^① 例如斯凡在《公开的情书》发表后，与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的通信和对话；这些“再解释”、“再阐发”和“再确认”，还可以参见刘青峰、黄平《〈公开的情书〉与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礼平、王斌《只是当时已惘然——〈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② 该文完成于2011年8月26日，到现在还没有公开发表。

4 七十年代小说研究

4月份的时候，在听到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时，邓小平气愤地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是破坏，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问题的时候了。”……5月8日到29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中央把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十一个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决心下大力气进行整顿，解决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在讲话中，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简要明确的作风，两句开场白后，便单刀直入地讲道：“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他所讲的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现在，在干部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①

这里蕴含着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信息：改革开放竟以《机电局长的一天》和邓小平讲话的方式蓬勃展开，他们谁都没有预料到一年后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将会因某个人的去世出现巨变。从历史的诸多乱麻中捋出的这条微弱线索，在我看来就是“起点性”的东西。有人说道：“风景一旦确立之后，其起源则被忘却了。这个风景从一开始便仿佛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似的。其实，这个客观之物毋宁说是在风景之中确立起来的。”例如，“谁都觉得儿童作为客观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儿童’不过是晚近才发现而逐渐形成的东西。比如，对于我们来说风景无可置疑地存在于我们的眼前，但是，这作为‘风景’乃是在明治20年代由一直拒绝外界具有‘内面性’的文学家们所发现的”。“这样的‘风景’是不曾存在过的，它乃是在一个颠倒之中被发现的。”^②这就提醒我们，不是具有改革意识的新时期文学作为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369页。

^②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112页。

“客观之物”一开始就存在于 80 年代的，只有把它们“颠倒”之后，才发现 1975 年的邓小平和 1975 年 11 月创作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建立关于“改革开放”的“认识性装置”了。这样 80 年代的改革文学，就可以一直追溯到 70 年代的改革文学的缘起上。

蒋子龙的两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和《乔厂长上任记》可以放在一起观察。《一天》中的主人公霍大道受 1975 年大力整顿的鼓舞，想把“文化大革命”浪费的时间“夺回来”（小说自然不敢这么明写）。他计划在暴雨山洪到来之前，用五天时间把四千多台潜孔钻机生产出来。思想守旧但稍有理性的副局长徐进亨不同意他这种急躁冒进的做法，矿山机械厂厂长于德禄也觉得这项任务与工厂实际生产能力不相符。霍大道一边批评他们，一边直接跑到生产第一线发动工人群众，结果还真如期完成了生产任务。作者虽然没有明写，然而邓小平所指出的因为“闹派性”使得“领导班子软、懒、散”和“不敢摸老虎屁股”，使国民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瘫痪的形势，是促使霍大道打乱工作程序大胆推动矿山机械厂生产潜孔钻机的关键原因。1979 年前后，机电工业局局长霍大道决定派乔光朴到两年半都没完成生产任务的重型机电厂当厂长。乔光朴当众立下军令状，对全厂九千名职工进行考核，将不合格的干部和工人收入服务大队搞基建运输，留下精兵强将突击抓生产。乔光朴顶住下岗职工向上级告他的压力，为解决生产材料和燃料问题亲自出差“搞外交”，但因不懂“关系学”大败而归。另外，改革家乔光朴还得抽出手来对付政敌副厂长冀中和冤家郝望北。当这位改革悍将在大会战前夕陷入各种困难无力自拔时，局长霍大道及时施以援手命乔光朴年轻时代的恋人童贞担任厂副总工程师和党委常委。改革派这边立即士气大振，干部工人思想混乱局面得到很大改观。为击碎厂里流言，稳定全厂大局，乔光朴当众宣布与童贞举办婚礼。

1975 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寿终正寝，1979 年的中国将掀开改革开放时代新的一页。党内的激进势力一直想把国家引向持续动荡方向，党内务实派则要终结这一历史悲剧，开始描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蓝图，两篇小说就诞生于双方的激烈博弈之时。就在这转折年代，要求改革的呼声从党内蔓延到全社会，作家蒋子龙顺应历史巨变及时叙录这一关系中国命运的大潮。以霍大道为代表的干部和工人的“改革呼声”虽然“没有

6 七十年代小说研究

清楚地浮现到历史的地表上来”，但确实是“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于作品内面的。这种“隐形的方式”，让我们隐约嗅出几年后《乔厂长上任记》释放的更加公开和丰富的改革信息，还曾为这种时代巨变激动过。但反过来，正是因为读了《乔厂长上任记》而激动，经过数十年的历史变迁，我们再从这篇小说提供的角度“回望历史”时，才明白它原来并不是第一篇“改革小说”，第一篇改革小说实际是《一天》。这一点告诉我们，中国民众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并不是自1979年才开始的，说不定从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人们都不敢这样大胆地表达。历史潮流的涌动看似从1979年出现的，但它的最深处的潮汐一定在1975年前后就潜藏着了，只是在等待一次合适的爆发而已。文学史从不曾注意到这一点。人们总以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是以1976年为起点的，其实竹内好前面已经有了精彩分析：“风景一旦确立之后，其起源则被忘却了。这个风景从一开始便仿佛像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似的。其实，这个客观之物毋宁说是在风景之中确立起来的。”还强调说：“这样的‘风景’是不曾存在过的，它乃是在一个颠倒之中被发现的。”这就是说，当我们把被视为新时期“正宗”的改革文学“颠倒过来看”的时候，才发现那里面并没有“起源性”的东西，“风景”一旦确立之后，“其起源则被忘却了”。

我想这也许是开展70年代小说研究的第一个可能性。并不是看70年代小说有没有文学性，而是看这种起源性有没有研究的价值。如果我们认定它的起源性确实有价值的话，那似乎再看什么文学性实际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

二 小说也是一种史料

小说不仅具有观赏性审美性，也是一种史料。它是对历史的某种留影，可能还是比历史教科书更为忠实的对历史真相的记录。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人们能够洞悉法国资本主义上升期从巴黎到外省的社会结构重组和人们观念的剧烈变化。在鲁迅小说里，大家能明白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南方小镇的社会波澜。借助柳青的《创业史》，我们看清楚了在50年代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适当安放几亿农民的命运遭遇的难题，以及这种社会改革试验失败的历史。我们想了解80年代青年对改革开放

的真实想法，社会转型对他们的人生道路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能不读徐星、张辛欣、刘索拉、路遥、遇罗锦和贾平凹等人的小说的。如果将这些小说放进历史长河中，作家在小说里对人物思想行为惟妙惟肖和极丰富的描写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其实一点都不比图书馆里堆积如山的历史文献单薄和逊色。

我们在70年代“两报一刊”所代表的正史中，是看不到细致真切的历史的，但是小说却将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留在了人世间。“文化大革命”初期，《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中学生李准平带红卫兵去抄市政府参事、国民党原二十五军代理军长楚轩吾的家，没想到他竟是恋人南珊的外公，而且他居然是被自己解放军将领的父亲在淮海战役中俘虏的。当他进一步追问楚轩吾还有什么家人时，南珊和她弟弟在他面前出现了，这使李准平震惊不已：“现在我们却在这样一种场面中重逢了：她将要受到一番无情的盘问和训斥，而我却坐在审问席上。”通过楚的自述，李准平懂得了他是一个有历史反省能力和良知的老人。李准平因内疚追到载着南珊等知青的火车上，还偷听到楚轩吾教导外孙女要原谅伤害者的一番话。李准平的“文革信仰”随之垮塌了：

楚轩吾固执地摇了摇头：“你是个没娘的孩子。我真担心，你会因为自己缺少幸福就对他人冷漠。你把整个心都埋到书中去了。难道你真的已经将人间看得萧瑟惨淡了吗？告诉我，孩子，你究竟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如果你对千千万万的人还怀着眷恋之情，外公就放心了。但是，如果你由于我们家族的罪过而感到世事坎坷，或由于书看得太深太多而学得只会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人世间的一切，那你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心地冷酷的人，你会把自己的块垒看得高于一切，把自己的理念看成老百姓的上帝，其他人都不过是你对世界秩序进行逻辑演算的筹码而已。这样的人，外公是不赞成的。珊珊，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不失赤子之心。所以，我只愿你心中有理，却不愿你心中无情。无情之心，对己尚可，若对人，就是有罪。”……

……南珊坚强地抑制住自己的抽泣……

老人在公理荡然无存的紧要时刻，却告知外孙女要站在历史高度原谅

8 七十年代小说研究

并超越这一切，对人和人间怀着“赤子之心”，这样的小说描写所具备的史料价值，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吧。它警示人们，即使在前所未有的黑暗的年代，也有人在默默地坚守道德的底线。

版本学家陈子善把他考订史料的著作戏称为“边缘识小”，但这种工作实际具有认识文学作品创作价值的“起点性”的意义。^①解志熙在谈到现代诗人于赓虞一封创作通信《〈北风〉之先声》时也强调：“或许有人会这样说，诸如此类的文字讹误影响不大，不校也罢。但有些文字讹误，的确‘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若不校理，文章是读不懂也不能援引的。”^②讲的同样是史料对于认识文学作品创作起点的重要性。他们没有明说，但都承认史料对于留存历史真实性的关键作用。这就使我们暂时放弃了对70年代小说是否拥有文学性的固执坚持，而回归到它是否具有史料的真实性的研究层面上。因为按照两位研究者的理解，文学作品真实性—史料真实性—文学史研究真实性的循环往复，对于通过文学作品理解这些作品所表现、所揭示和所记录的时代，几乎是无可替代的。那么按照这种理解，既然70年代的“正史”著作许多是不可靠，甚至是故意云遮雾罩和捏造的，小说之“记述历史”的功能和它被当做一种重新认识历史真实性的史料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就建立起来了。

两位史料专家的研究使我意识到，在研究者视野里，所有小说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史料具有的历史客观性，不仅证明“地下小说”、“十七年小说”、70年代公开发表的小说也有研究的价值，如果说我们在这些小说的不同层面提取的史料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可以说从不同层面提取的史料拥有同等的价值。比如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一个晚上，当了红军的父亲跟着队伍撤离了这个村子，因为有人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改变成错误路线，导致红军接连打败仗。父亲走之前，给了儿子潘冬子一颗红五角星。第二天晚上，留在村里养伤的党员介绍冬子的妈妈入了党。就在这凄风苦雨的日子里，还乡团头子地主胡汉山卷土重来，他抓来所有村民，宣布夺回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夜里，为掩护被救出的乡亲们撤到山

^① 陈子善：《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引自其著作《边缘识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7页，这部分他讨论了手稿对于认识一个现代作家许多个“创作起点”的价值。

^②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里，母亲点着蜡烛梳妆打扮吸引狗腿子们的注意力，被胡汉山烧死在茅屋中。为替母亲报仇，小小年纪的潘冬子走上了革命道路。稍有点70年代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篇成长小说，是那个年代的典型的励志小说。它通过向青少年一代反复灌输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斗争史，令他们巩固接革命的班的历史观。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我们那一代人都愿意接受这类“家庭苦难一走上革命道路一才是人生正确选择”的历史逻辑模式呢？这是因为70年代小说借助文学复制手段，将这个逻辑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从娃娃抓起”）。因此，我们说这篇小说有史料价值，并不是说这种史料本身是真实和有价值的，而是说从这史料的整理分析中可以看到70年代的教育方式，70年代人的思维方式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与史料相关的这种教育方式和思维方式是有价值的，而是说建立这种教育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问题本身是具有史料价值的。解志熙在前面说“或许有人会这样说，诸如此类的文字讹误影响不大，不校也罢。但有些文字讹误，的确‘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若不校理，文章是读不懂也不能援引的”，在这里就具有深刻的意味了。因为如果我们再不愿意研究70年代公开发表的小说，认为它们都没有文学性，那么这种小说的史料价值就会随着一代的去世而逐渐地消失。所以，解志熙才会说出“不校也罢。但有些文字讹误，的确‘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若不校理，文章是读不懂也不能援引的”这样具有文学史意识的话来。

由此我想到，如果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一种史料，是对历史的某种留影，是比历史教科书更为忠实的对历史真相的记录，就不能说《闪闪的红星》不是一种史料，不是对历史的某种留影，不是比历史教科书更为忠实的对历史真相的记录。它们只是在文学史档案馆的不同书柜中存放着。如果说只有一层书柜中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是真实的，还不如说将所有层次的书柜中的文学作品组织在一起，更能揭示出时代辽阔的语境，与时代语境相结合的这些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才更多层、丰富和真实。确切地说，我们今天之所以看不起《闪闪的红星》这种小说，那是因为支撑着它们的左翼文学被“重评”而历史地位一落千丈的形势所造成的。反过来说，如果几十年后，人们再对当年“重评左翼”的现象进行“重评”的时候，说不定存放在左翼文学书柜里的《闪闪的红星》等作品的历史位置就会发生移动。“若不校理，文章是读不懂也不能援引

的。”文学史的研究，就是这种反复“校理”的过程。更进一步说，“没有七十年代，何来八十年代？”假如说70年代的小说最后都变成“读不懂也不能援引”的话，我们又如何去理解80年代的中国会爆发改革开放的强烈诉求呢？实际上，很多作家都抱怨过文学史家总是把他们归放在一个固定的书柜上，“被放到单一的视角里面去观察”的话。刘心武说：“近三十年的文学研究，其实存在着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作者、读者，不满足的就是，都是线性研究，只注重点、节，比如‘伤痕文学’之后就是‘改革文学’，‘改革文学’之后就是‘知青文学’，那么每一个点就把前面那个点给遮蔽了。”他抱怨的原因是，他20世纪90年代后还写过《四牌楼》、《树与林同在》、《民工老何》、《人和鱼》等许多新作品，这些作品却因为《班主任》的巨大名声被“遮蔽”了，没有被评论家注意和理睬。^①刘心武虽然没有我们这种“史料意识”，但他这种说法还是有史料眼光的，他不仅把他写的《班主任》看做是历史，也把他写的《四牌楼》、《树与林同在》、《民工老何》、《人和鱼》等作品纳入自己的创作史。他是在抱怨我们因为把《班主任》放在经典小说书柜中，就不再承认他其他小说历史价值的这种做法。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说小说绝对是一种史料，它主要是就大时代的小说来说的，平庸时代的小说作为史料的重要性就会明显地降低。因为平庸时代的小说记述是以家长里短为特色的，而大时代的小说家所概括的则是时代的本质。《金光大道》是试图设计一个近乎天堂般美妙的中国乡村社会，《闪闪的红星》是强调选择正确路线对于农民的命运有多重要，《机电局长的一天》目的是督促中国必须进行企业改革和走出历史困境，《公开的情书》是在探索青年人如何实现精神生活的独立的问题，《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与我们讨论在黑暗的年代坚守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等等。它们都不是小气的小说，我们如果真想了解中国人70年代所走过的曲折复杂的道路，这些小说是不能不读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当然，我更愿意说，70年代报刊和各种著作给人们提供的历史史料，恐怕是史上伪证最多、讹误最多也最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它们反话正说的

^① 刘心武、杨庆祥：《我不希望我被放到单一的视角里面去观察》，《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醒目的话语特征，让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为之汗颜。在国家正史资料的可靠性大为贬值的历史时期里，小说作为鲜活生动的史料也许是最好的补充。70年代小说就这样具有了填补历史空白的文学功能。70年代小说可以说是20世纪中叶中国人生活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在一个精神生活都死去的年代，这幅图画却顽强地记录了我们永远都不该忘却的年代生活的所有的细节。

我想这也许是开展70年代小说研究的第二个可能性。不过这种研究一定要撤除人们在“地下小说”与“公开小说”之间所设置的栅栏，去掉它们之间的历史等级，恢复70年代小说的众声喧哗，否则研究者就难以对逝去的历史做更理性和长远的打量。

三 研究者是在重温自己的历史

说过70年代小说的起点性的东西和它的史料性之后，就要面对研究者自己了。在章太炎、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人身上，我发现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不是可以用名利来概括的，这些学者实际都是在借学术研究探索自己思想生活的真实性的问题。

北岛和李陀2008年编了一本很好的书，书名叫《七十年代》。我说它好不是说体例、篇目和人选如何完美和没有任何争议，而是说它起了一个很好的头，它让我意识到把“重返80年代”的研究起点设定在70年代更为稳妥，这样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思想和文学的整理就会稍微宽阔和深远一些。王安忆在这本书的一篇非常短的文章里写道：

文工团的男女普遍年轻，大多在十二三岁招来，满二十岁就有成人感，特别能感觉年华易逝。有一次去地区医院，听医生唤我“小女孩”，十分的不适和反感，这就是我们对年龄的概念。想不到之后还会有很长的岁月要度，很多的改变要经历，会拥有很多很多、多到令人厌烦的照片图像。七十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个别的人与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零碎就够我受得了。并不经常地，仅是有时候，我会从拥塞的记忆中，辟出一个角，想起魏庄。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霸顶，非喜非悲，却是有